

编者按 马烽与柳青都荣获“人民作家”称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今日作家如何讴歌伟大时代、如何书写人民心声，从两位老作家身上可以得到启迪与借鉴。

# 马烽写作的“三个原则”

杨占平

1987年春天，作家马烽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曾明确表示：作家不管写什么，怎么写，只要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能给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精神食粮，都应该允许。用他形象化的说法是：就像街上的小吃，只要有营养，符合卫生标准，卖什么都行。他从不把自己的创作主张强加于别人，但他自己选择的路子也决不改变。总结马烽60多年文学创作生涯，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则”：让农民读者喜欢，认定深入生活的路子，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作为一个作家，真诚和一以贯之是最宝贵的品格，而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却为数不多，马烽做到了。

马烽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懂得中国农民有喜欢故事的习惯。对于大段的风景描写、冗长的心理分析、重叠的倒装句子，他的态度是：“我毫无贬低这种表现手法的意思，相反的，我倒是觉得有不少可以学习借鉴之处。我只是说这种形式、知识分子比较欢迎，而不适合中国农民的胃口。”正如赵树理是要让他的作品打入地摊书籍中，马烽是要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或者夏日的傍晚散坐在打麦场上乘凉时候的读物。他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农民，不仅是由于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而且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因此，马烽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之所以要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艺术表现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吸引农民及农村干部。

最早也最能体现马烽为农民写作思想的，是1945年到1946年跟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是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边区涌现出无数的民兵英雄事迹，层出不穷地传播于群众当中。马烽和西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创作“冲动”。正好，1945年春天，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马烽和西戎所在的《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他俩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农民群众喜欢的、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1945年6月，《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面世，作品马上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队员武得民，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马烽自己的切身体会更深，他后来曾回忆说，有一回他到兴县界河口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了他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对他特别热情，并告诉了村民们。晚上，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

登出来的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一直讲到鸡叫，故事里把敌人“挤”走，大家才满意了。

马烽成为知名作家后，经常有人问他：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经验和诀窍？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实实在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获取素材。他在许多篇创作谈文章中，谈得最多的是深入生活话题；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或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深入生活；他与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学爱好者，还是诚恳地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脱离生活。

马烽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他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上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总是不满意。他一有机会就去农村走走，从不用记者采访式方法，总是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骑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也从不把他当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老马”。正是有了这段经历，两三年工夫，马烽写出了十几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如《饲养员赵大叔》《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其中的几个作品当时就轰动一时；在读者中的反响非常大，几十年以后也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他与赵树理、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文学界的一个热点，也是后来人们称他们为“山药蛋派”的重要依据。

进入新时期，马烽年岁大了，不再骑自行车，坐上了汽车，但他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他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两人结伴下乡，跑了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平定等地，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农民群众，实地考察了好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同时，结合他们几十年对农村生活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反映县委书记朱克实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剧本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马烽一直以真诚的责任感感

## 当旅行成为一种习惯

乔 叶

旅行于我而言，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的形成，是写作带来的重要福利：都是采风活动。采风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采风。

这些年走的地方很多，新疆的戈壁、沙漠和雪山，内蒙的草原、森林和河流，秀美之江浙，大美之青藏，粗犷美之东北，浩渺美之南海……走的地方越多，就越是觉得这个世界真大啊。

世界越大，我就越小；越小，感觉就越好。好在哪里呢？

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在我生活的地方，我似乎是重要的，许多事仿佛都缺我不可似的。这真是一种幻象。事实是我离开后，以我为结点的那个世界依然在很好地运行着——那张网经常会漏的，漏了就会有补的。网依然在，

铁打的网，流水的结点。

我是一个很陌生的人。平素的生活圈里，走到哪里都是熟人，就不免敷衍继承，问候寒暄，亦不免因此心生不爽，所以我一年也不逛几次街，更不逛超市。而旅行的时候，便干脆干脆地做一个再纯粹不过的陌生人。一个人故意落着单，摘摘花，踢踢草，招招猫，逗逗鸟……看着孤零零的，很可怜的样子吧，可我的舒服我知道。这个时候，随便做点什么都好的呢。

我是一个很沉默的人。日常的语境里，虽然也常常不想说话，可若是太沉闷就会让别人生疑感、有歧义。唯有旅行的时候，我想少说话就少说话，想不说话就不说话。不和蔼可亲，不善解人意，不随声附和，不凑趣逢迎。我成了一个各色的，别扭的女人，也成了无比简单的我自己。

## 褒优贬劣 激浊扬清

党云峰

文学评论界曾从作品的海洋中“捞”出不少经过几十年的检验、被人们视为经典的作品。在市场因素介入后，对研讨会的需求日益增大，一些评论家囿于情面、关系或基于其他因素，开始跑会，甚至一天能赶好几场。以赶场的态度面对文本，往往是随手翻翻甚至在会议现场才拆开封塑，这样只能泛泛而谈，更不会出现高质量的评论文章。

由于没有时间充分查证，在讲到古代文学史相关题材作品的时候，有些评论家甚至会把文学作品的名字说错；在提到国外相关文学评论流派观点的时候，有些评论家一味照搬，浮躁的心态可见一斑。如今很多研讨已经成为单一的表扬，严重削弱了文学评论的作用和公信力。

文学评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文学评论家要有独立的品格。既要有人格的独立，也要有思考的独立。当代文学评论一度深受西方的影响，但剥离语境的西方文学评论能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在创作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吗？显然，不能削足适履，而应该明确术语的范畴和应用条件。然而一些文学评论家所谓的跟国际接轨，只是把西方的理论术语搬过来，在板起面孔解释中国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时无法切中肯綮，文中的术语只是各种流派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文学评论家要有发现的眼光。要善于发现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在文学史的时间轴上指出当代作品与经典作品的距离有多远。文学评论家既要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匠心，又要

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或者赞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淳朴心灵。他的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上世纪从40年代到80年代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50年代，他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比如《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属于前一类；而《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属于后一类。

新时期以后，马烽一如既往，继续以真诚的责任感去创作。所不同的是，他的作品由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社会变革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研究。比如，中篇小说《伍二四十五纪要》以农民式的幽默，对农村三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反思，用一个普通农民的戏剧性遭遇，讽刺了虚假的工作作风；《结婚现场会》则运用独特的构思方式，从经济和生产发展的角度提出农村买卖婚姻的严重性。最有代表性的，是他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要说明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才是方向的道理。“农村三部曲”以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农村青年形象。这些青年是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是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人物，体现了两位作家倡导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期盼农村深化改革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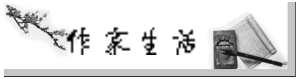


马烽(左三)在汾阳贾家庄与村干部交谈。

不重要的、陌生的、沉默的……这种状态中的我，旅行就不仅是新鲜，不仅是长见识，而是真正的放松、放空、放下——我是多么喜欢这种状态中的自己啊。这才像我呢，这才是我呢。享受着这种喜欢，看什么风景就都成了好景。

当这样的旅行成为一种习惯，和自己独处也便成为了一种习惯。

我无比由衷地觉得，这真是一种好习惯。



“80后”导演、编剧田波，以6年时间拍出的电影《柳青》是一部拍摄难度很高的影片。柳青扎根陕西长安县皇甫村14年，写下了长篇小说《创业史》，作品描述当代中国乡村生活巨变，成为影响路遥、陈忠实等中国作家、读者的史诗，柳青也成为当代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过柳青，他说：“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如何将一个观众熟悉的公众形象转化为令人信服的艺术形象，便成为一个难题。另外的难题在于，如何表现“扎根”？如何表现《创业史》的创作过程等？这些历史与生活细节是琐细的，也是单调枯燥的，如何将之纳入影片构成一个艺术整体？影片的主创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以柳青扎根皇甫村、创作《创业史》的过程，以及作家与妻子马藏相濡以沫的爱情为线索，为我们奉献了一部佳作。

表现柳青扎根皇甫村，影片是从作家的发型和服饰变化开始的。最初出场时，柳青一头浓密的黑发，西装革履，很洋气，很有现代感。这时的柳青作为《中国青年报》的创办者之一、编委和文艺副刊主编，作为刚刚访问苏联归来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其意气风发的形象是真实可信的。但随着其到达皇甫村与农民交流时，他的发型和服装就成了一种障碍，农民总感觉他是上边或外边来的人，跟他们不是“一伙儿”的。于是柳青痛下决心，剪去黑发，剃成了农村中常见的光头，脱去西装革履，穿上了粗布大褂和布鞋，当他摇着蒲扇和老农民坐在树下拉话时，已经开始融入他们并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了。这当然只是初步的，随后柳青参加了农业合作化各阶段的实际工作，熟悉和了解农村各阶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并创作了《皇甫村三年》《狼透铁》《创业史》等作品。影片抓住了这些生活细节，以视觉形象的变化表现柳青内心的变化，起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当我们看到风度翩翩的青年柳青一下变为“老农民”柳青时，当我们看到柳青摩挲着光头，摇着蒲扇加入农民们的聊天时，不由自主地感到了心灵的震撼。

《创业史》这部经典作品及其创作过程，无疑是影片要重点表现的内容之一。创作本身是艰辛而孤独的，仅仅表现作家伏案写作和思考感悟是不够的，好在《创业史》是一部与时代同步的现实主义巨作，小说中的梁三老汉、梁生宝父子生活中的原型就是王家斌父子，影片细致展现了柳青与王家斌父子交往的经过，以及从他们身上获得灵感，将他们塑造为典型的艺术人物的过程。当然，柳青想要表现的不只是这两个人，而是中国农民在历史中变化和成长的过程，用柳青的话来说，他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影片通过柳青与王家斌父子及众多村民的交往，让我们看到了他如何将一个宏大命题落实到一个小村庄之中，又如何将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讲述成为一个“中国故事”，而在这一过程中，王三老汉因裹着历史重担成为了“旧式农民”的代表梁三老汉，而王家斌则成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梁生宝。影片还原了柳青在皇甫村的生活环境，表现了他参与组织合作化的过程，他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珍的文学交流，他将《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捐献给农业社，以及特殊年代王家斌等人保护他的故事等，在时代风云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柳青形象。

片中，柳青与马藏的爱情故事作为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极为感人的。影片基本根据柳青女儿刘可凤撰写的《柳青传》改编，但是又超越了一个女儿的视角，而从更为客观的角度讲述了他们的情感故事。两位主人公的爱情在初期是甜蜜的，但是又无不波折。影片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柳青与马藏相濡以沫的动人情感。马藏去世后，柳青为将《创业史》四卷写完，以坚强的意志力活了下来，他的最大心愿虽然没有完成，却为新时期作家的探索开辟了道路。

电影《柳青》以现实主义精神聚焦作家的生活、创作和爱情，为我们展现了柳青的奋斗和心灵史，影片紧紧抓住了柳青及其文学的人民性，生动呈现了柳青与王家斌等人的互动过程，为我们刻画出一个丰富而单纯的人民作家。作为一名青年电影人，田波为创作《柳青》不仅走遍了柳青走过的每个地方，而且遍访柳青的家人与研究者，数易其稿，最终将柳青的形象搬上了银幕，这既是对柳青创作《创业史》的生动再现，也是新时代青年的一部生动“创业史”。



电影《柳青》海报